

津沽学人

为万里长城“解图”
——张玉坤与他的长城巨系统研究

李哲 王天莲

在大多数人眼中,长城是一道墙,一段史,一曲民族精神的咏叹。然而,在天津大学张玉坤教授的视野里,它首先是一个等待被“解图”的、复杂的空间巨系统。

作为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玉坤多年的研究,正是将建筑学与城乡规划学的系统分析方法,深度植入这绵延万里的遗产机体,从纷繁的物质遗存中,解读出一套层次清晰、运作高效的空间逻辑与组织密码。他的工作为科学认知与保护长城遗产开辟了新的学术路径。

万里长城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

2003年年初,张玉坤教授带领团队启动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北方堡寨聚落研究及其保护利用策划”。在对晋北、陕北等地的田野调查中,他敏锐地观察到,大量散布于荒野的废记古堡与村落,并非孤立存在的居住点,而是在空间逻辑与功能布局上与明长城墙体有着严密的组织关联。这一发现触发了他的学术直觉:长城绝非只是一道封闭的墙垣,其背后隐藏着的一个庞大且尚未被系统解读的军事聚落体系。

当时国内长城研究多聚焦于历史文献考证、考古发掘或历史地理分析。作为建筑学者的张玉坤注意到,长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线性防御工程,其在国土规划、防御空间构成、营建技术以及与之共生的聚落形态等维度的价值,在建筑学与城乡规划学科中仍处于系统性研究的边缘位置。

基于对这一学术空白的洞察,张玉坤果断调整研究重心,从广义的北方堡寨研究专项集中聚焦至长城地带军事聚落的体系研究。2006年,他又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正式开始了对明长城军事聚落与防御体系的基础性研究。2016年,建筑文化遗产传承信息文化部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在天津大学建成,长城建筑遗产保护与信息技术应用是实验室主攻方向。基于这一认识,张玉坤带领研究团队,开始了对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及其相关遗存的长期田野调查与测绘工作。研究范围从明长城主线不断扩展至历代长城遗迹。与以往考察不同,团队运用建筑测绘、空间分析等专业方法,对关城、堡寨、烽燧、边墙等各类遗存进行了翔实的记录与数据采集,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空间形态资料。

通过对海量田野调查资料的归纳、比较与分析,张玉坤提出了理解长城的一个核心学术观点:长城并非一道孤立的墙垣,而是一个结构严密、层次清晰、功能复合的巨系统。他将这一宏大的工程系统分解为边墙系统、屯兵系统、烽传系统、驿传系统等多个子系统。研究阐明,这些子系统由不同等级、不同功能的建筑实体(如镇城、路城、卫、所、堡、关城、敌台、墙台、烽火台等)作为物质载体,通过道路、信息等线路相互联结,共同实现兵力部署、情报传递、后勤供应与梯次防御的完整军事功能。

这一基于系统论和建筑层次分析的研究框架,首次以建筑学的专业语言,清晰解析了长城作为复杂工程系统的内在组织逻辑。该理论不仅深化了对长城本质的认识,也为长城遗产的价值评估、构成界定和保护管理规划,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依据与方法论基础。

开启长城研究的“数字化长征”

在确立了“长城巨系统”理论框架后,张玉坤教授并未止步于宏观论证,而是以前瞻性的眼光开启了长城研究的“数字化长征”。在他的整体指导下,团队成员李严主持构建了明长城防御体系空间数据库,将分布在万里之遥的墙、堡、烽、驿等资源进行空间维度的逻辑关联,使长城这一复杂系统的运作脉络在数字世界中第一次变得清晰可感,填补了长城防御机制量化的空白。

为解决长城资源分布广、损毁快、人工测绘难的问题,张玉坤指导团队成员李哲利用无人机低空测绘等信息技术,开展了长城全线图像和实景三维数据库建设。该工程实现了对明长城全线厘米级的高清影像采集和数字化建模,完成了对长城现状的全面数字切片。这一数据库的建成,不仅为长城预防性保护提供了精准的空间底图,也为长城墙门、附壁等重要遗存的发现提供了技术支持。

这两大数据库的落成,不仅为长城这一世界级文化遗产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数字化档案”,更由于实景三维技术的应用,使长城的保护有了精准的数据支撑。它们不仅



◀从左至右分别为张玉坤教授主编出版的《六合文稿》“长城·聚落丛书”、大型史志专著《中国长城志:边镇·堡寨·关隘》。

业人才的接力。在人才培养方面,张玉坤教授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田野调查的严谨性与基础资料的重要性。多年来,他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国内高校、文博机构和规划设计单位在文化遗产保护、建筑历史研究等领域的中青年骨干力量,实现了该方向研究人才的持续输送与学术脉络的传承。

张玉坤教授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超越了纯学术范畴,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影响。其关于长城体系、层次与价值的研究框架,为近年来国家推进的长城资源调查、保护规划编制、保护工程实施,尤其是当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顶层设计与规划实践,提供了关键性的理论支撑和学术咨询。他将长城视为古代国土空间规划实践的视角,也为理解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与国家空间治理的关系,提供了历史参照。

在平日的教学 and 工作中,我们能感受到张玉坤教授是一位极具亲和力的老师,他能够照顾到每位同学的情绪、心理,总是给予鼓励、支持,提出修正意见的时候也很讲究方式方法,让学生普遍乐于接受。他还是一位对学生心理把握非常准确的老师,话不多,但是每句话都“点在点儿上”,总是在最关键、最必要的时候指点学生,一句话切中要害、几句话剖析深层想法或原因。即使对于已经毕业,科研工作走上正轨的青年学者来说,这种引导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张玉坤教授的学术生涯,体现了社会科学扎根中国大地、回应重大文化遗产保护需求的特点。其工作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建筑学的系统分析方法为工具,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开创了长城体系化研究的新阶段,提升了建筑学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贡献度,是为“学术有造诣、学科有传承、学人有品格”的当代实践。

(作者李哲系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莲系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在读博士生)

19世纪末,因年久失修,海河河道淤积严重,加上本身河道弯曲,船舶很难驶入河道抵达紫竹林码头装卸,为此,一些洋行和国内外机构陆续在塘沽修筑码头、仓库,方便大船停泊卸货,由此带动了塘沽地区码头和仓储业的发展。塘沽地处渤海之滨,一千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汪洋,距今700多年时成为滨海低地,并逐渐发展起聚落。塘沽得名于清末,初称塘二沽,意即大沽之后的第二个村子,简称“塘沽”。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为停泊军舰,运输士兵、枪炮与给养,各国纷纷在塘沽修建码头。此后塘沽码头逐渐发展起来,多国在此修建码头,如英国怡和、太古的东沽小码头,法国的义兴码头,德国的东兴、德大码头,美国的美孚油码头,俄国的久大码头等,中国的招商局、开滦矿务局、久大精盐公司等也在塘沽设有码头。1935年之前,塘沽地区共有6个国家设置的21个码头,基本能满足2000吨级轮船的停泊需求,个别码头如华裕码头甚至可以同时停泊5艘2000吨级轮船。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天津期间,出于掠夺和大规模运输物资的需求,需要建造一个规模更大的海港。1938年,日本内务省派遣调查队在塘沽和青河口实地勘测,最终以运输便利、修建时间短,以及接近天津(市区)/发展工商业易见成效为由,决定在塘沽修建新港。1939年6月19日在北平设立了“北支新港临时建设事务局”,1940年7月该局移驻塘沽,同年10月25日开工。1942年7月第一码头落成,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仅完成修建计划的30%。抗战胜利后,塘沽新港由国民党交通部平津特派员公处接收,1945年12月筹建“塘沽新港港务局”,1946年4月23日成立“塘沽新港工程处”,对塘沽新港进行维护和修建,并制定了三年筑港计划,新港工程重新启动;但因物资匮乏、运输困难、电力不足,加上国民党组织、管理不善,塘沽筑港工程进展缓慢,至1948年年底,航道和港池淤填严重,国民党逃跑时掳走工程图纸、物资器材,甚至沉没船只,新港成了“死港”。

新中国成立后,因经济建设需要,华北急需一个有巨大吞吐量的港口。1951年,塘沽新港的建设再次被提上议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领导,成立“塘沽建港委员会”,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担任主任委员,天津市市长黄敬等人为副主任委员,并制定了塘沽新港建设计划,力争1952年冬季万吨级轮船能驶入塘沽新港停泊装卸,第一期建设工程全面展开。5000余名工人、干部打捞和修复了200余艘被击沉的工程船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建港劳动节约竞赛运动,工人提出合理化建议1949件,其中1108件被采纳实行,及时排除工程施工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提高了劳动效率。如在码头加固中的打桩和穿拉桩工程,最初使用3吨重的汽锤敲打木桩,连打两万下,一个星期才勉强打入1根桩,如此,两年也完成不了打桩任务。为加速这一工程,职工们连续提出9种合理化建议,使打桩效率由一星期1根提高到一天14根,穿拉桩工程也由一星期1根提高到一天14根。在筑港工程中,这种创新纪录多达1280件,涌现出一批建港模范。新港工人凭借手钩、垫肩和破棉袄这“三法宝”,靠人拉、肩扛提前完成了建港任务,创造了全国港口建设史上的奇迹。1952年10月17日,新中国第一座自主改建的万吨级深水港——塘沽新港正式开港,万吨级轮船“长春号”“北光号”“海安号”等驶靠码头装卸。周恩来总理专门为新港开港题词。10月25日,毛泽东主席专程视察塘沽新港。塘沽新港的开港,结束了天津港不能停靠万吨轮的历史,初步完成了由河港向海港的转化。

此后,天津港不断扩建和完善配套设施。1957年至1961年,启动并完成第二期扩建工程,新建5个万吨级泊位,扩建1个万吨级泊位,加深航道深度。1973年,全国掀起“三年大建港”热潮,天津港作为其中“主战场”之一,开启了第三期扩建工程,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同年,天津港成功开辟了我国第一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1981年,天津港建成中国第一座专用集装箱码头,开启了中国集装箱运输新纪元。1984年,天津港在全国沿海港口中率先实行“双重领导,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和“以港养港,以收抵支”的财政政策,成为港口管理体制改革的先行者。自1993年起,天津港货物吞吐量以每年千万吨级递增,2001年成为我国北方第一个亿吨大港,跻身世界大港行列,2007年吞吐量突破3亿吨,6年间吞吐量连跨两个亿吨台阶。2010年,天津港成为我国北方第一个4亿吨大港,新开发集装箱航线28条,实现了对世界主要港口的全覆盖,港口等级达到30万吨级,成为面向东北亚、辐射中西亚的集装箱枢纽港,中国北方最大的散货主干港,环渤海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港口。2021年,天津港建成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全球首个港口自动驾驶示范区。2025年,天津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5.95亿吨,同比增长2.7%;集装箱吞吐量2403.2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3.2%,位居全球港口前列。

从“三法宝”人拉、肩扛起步,到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领跑世界,天津港70余载沧桑巨变见证了中国港口事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革创新与跨越腾飞的创业足迹。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撰写的系列文章“河海文化汇天津”至此已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本刊将连续刊发朱彦民的系列文章“甲骨文与天津”。——编者)

从新港到天津港

龚宁



摄影:记者 吴迪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津派原创话剧《赶大营》于2024年10月在天津首演,2025年赴新疆巡演,2026年8月18日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开幕大戏,登上北京舞台。该剧取材于清末天津杨柳青货郎追随左宗棠西征新疆的真实历史,生动再现了“三千货郎遍天山”的鲜活图景,旨在传承弘扬不畏艰险、爱国爱乡、敢为人先、坚韧不拔、艰苦创业、诚实守信的津商精神与“赶大营”精神,让厚重的历史底蕴焕发全新的时代价值。

“赶大营”“闯关东”和“走西口”是清代至民国年间三次规模庞大的内地向边疆移民浪潮,其中,赶大营的历史地位尤为突出。3000多户杨柳青人随军迁徙经商、务工、生活、定居的历史,既承载着他乡谋生、商业拓荒的初愿,更有保家卫国、“百艺进疆”的时代意义。清朝光绪年间,西北突然战火,外敌侵占国土,边陲岌岌可危。左

山海的守望相助,日常生活与经济往来中生发的族际交往,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基层社会的微样本。

这个跨越山海的商贾故事改编自作家王洪海(笔名晨曲)的同名长篇小说,作家多年沉浸在这一题材中,前后7次进疆采访。创排过程中,天津人艺主创团队搜集了大量亲历者后代的口述史,广泛查阅清史、天津地方史中的相关记载,考证了以安家大院为代表的杨柳青镇历史遗存,并前往新疆采风。剧中出现的每一幕都有真实故事原型。编剧、导演在设计主角安文忠与乔俊英以及白妞的两段情感戏里,巧妙安排让老年和青年安文忠同台,分别由表演艺术家吴京安与天津人艺张文明两位国家一级演员担纲,互相借鉴、共通共融,联袂展现主角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命运流转和对时代的审思。“小安”(安文忠)17岁即看



话剧《赶大营》: 演绎津商入疆诗章

何美

宗棠率数万大军西征,却面临物资与粮草匮乏的燃眉之急。以杨柳青镇安文忠为首的挑夫们响应号召,为前线运送药品及日常所需物资,遂产生了随军营开展贸易的“赶大营”及经贸商人“大营客”。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这群民间货郎挑着货箱、踩着风沙,于渤海之滨出发,跨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穿越茫茫戈壁,克服风餐露宿、商号被焚、驼队遭劫等困难,一路向西,八千余里路走了至少半年,终于抵达新疆大地。他们随军提供补给,如大漠里的“流动超市”乃至百宝箱,足迹绵延至天山南北。“八千里路云和月”,军民同心打赢战役,捍卫了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赶大营》以现实主义手法演绎了一段平民史诗,铺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普通民众以商贸和迁徙书写的家园共建画卷。八千余里路途中,有同胞之谊、“黄沙恋爱”、赤子之心与乡梓之情;在新疆,大营客们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各族群众在乡村和巴扎同吃、同住、同交易,一些大营客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结亲,还有人学会了当地语言。

大营客们在新疆“安营扎寨”,由行商发展为坐贾,成为“丝路商贾”。千年古镇杨柳青“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杨柳青年画、剪纸、风筝等民间技艺以及先进的农具、耕作技术等被大营客们带入新疆,促进了东西部互联互通。津疆跨越

到商机,成为“赶大营第一人”,深入戈壁瀚海,追逐大军步伐,从嘉峪关到伊犁,为湘军准备辣椒与烟叶,途经各地进货更新,几十年时光匆匆过,从杨柳青纤夫到大营客,再到“文丰泰”商号掌舵人“老安”,直到建起“沙漠之舟”骆驼队。从汴市到围脖,从长辮到头巾,“老安”更像当地人;穿上官服后,“小安”乐呵呵地为中年的自己戴上五品顶戴。在这个片段中,人物时刻刻画细腻,主创用戏剧的方式串联起赶大营历程与主人公人生旅途,以双向对话视角阐释多元一体的历史叙事。

该剧在服饰、道具和舞美方面也颇为用心。尤其在多媒体设计上,精心设置多块大屏幕,如航拍镜头一般,展现壮美雄浑的边疆,令观众如临其境——大漠风云变幻,“骆驼”行走舞台上;白妞送来满箱白银,是沉甸甸的情意,化作那红艳艳的头巾。剧中的道具如草鞋、布鞋、烟叶、烙饼、年画、剪纸等皆有意义,体现出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

《赶大营》不仅追溯、讲述了一段历史,更引领人们把穿越历史之目光投射到我们当下生活的时代。丝路续血脉,津疆结同心。在天津,杨柳青安家大院、周家大院等昔年大营客的居所,可供参观者追思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赶大营的故事说尽、道不完,等待着更多的解读与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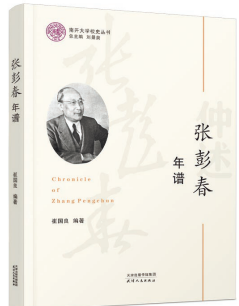


松谷泉声(中国画) 郭海青

崔国良编著的《张彭春年谱》近日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严谨的编年体结构,系统梳理了这位横跨教育、戏剧、外交与国际人权事业的世界级人物的生命轨迹。通读全书,可清晰地感受到编者多年的南开校史研究与戏剧史研究积累。这本书以扎实史料、跨学科视野与细密考订,勾勒出张彭春在20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史中的重要位置。

《张彭春年谱》以年、月、日为纲,串联起张彭春自1892年生于天津,到投身南开教育、推动近代戏剧改革、参与中国外交,再到走上联合国会场的一生。从参与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创建(改制)工作的教育家,到被誉为“北方现代话剧奠基人”,再到《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起草人,张彭春的多重身份在年谱中被纳入统一的时间结构,形成了一条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的思想与实践轨迹。

该年谱的突出价值,首先在于其将散见于校史、回忆录、人权史、戏剧史等不同领域的材料重新收束于同一框架之内。依托在南开大学长期积累的档案基础,研究文献与口述史料,编著者在书中不仅呈现了张彭春在教育制度建设、课程设计、戏剧社团活动中的多项贡献,还细致揭示了他与严修、张伯苓、周恩来、曹禺等人的学术联系、文化交往与理念互动,从而凸显他作为“现代中国教育与文化实验者”的一面。



其次,年谱揭示了大量长期被忽略的史料片段。在中国戏剧“走出去”的关键节点,如1930年梅兰芳访美,张彭春担任重要的协调者、文化阐释者和跨文化沟通者;1937—1940年赴美期间,张彭春频繁通过演讲、报刊、广播等途径介绍中国戏剧美学,以英文向美国公众解释中国戏曲的程式化与象征性舞台语言。年谱将这些零散史料纳入严格的编年系统,使“张彭春—中国戏剧—世界观众”之间的文化链条变得清晰可见。这不仅为研究近代中国戏剧如何在国际场域取得话语空间提供了新线索,也为当代关于“中国故事如何讲给世界听”的讨论提供了可追溯的历史参照。换言之,这部年谱不仅记录了张彭春的一生,更通过他的人生轨迹重绘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外交行动史、文化传播史与知识分子实践史。

此外,“张彭春在国际人权事业上的开创”是该年谱最具时代意义的部分。联合国官方明确张彭春是《世界人权宣言》重要起草人之一,1947年,他作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坚持把“良心”“兄弟情谊”等词汇写入宣言第一条,并以儒家“仁爱”观念调和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观察20世纪中国 与世界关系的一面棱镜 ——评《张彭春年谱》

杨一丹

该年谱的贡献还在于其追踪了张彭春在国际人权话语形成之前的思想准备与行动线索: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到回国后倡导以教育救国,再到抗战时期在欧美传播中国抗战真相、争取舆论支持——这些看似分散的经历,都在年谱中被重新串联,构成了一个内在贯通的思想路径——从教育权到生存权,从民族独立到人人享有尊严。在联合国的多边外交场域中,张彭春运用戏剧性的表达、跨文化修辞与哲学对话技巧,推动了《世界人权宣言》若干核心条款的成形。年谱提供的历史证据,为重新思考“人权的文化多元基础”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当代人权话语的构建提供了可追溯的本土先声。

总之,这部年谱不仅填补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重要空白,更让我们重新看到一个在国际制度建构、文化传播与人类价值讨论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中国学者。它不仅是呈现生平,更是以时间为线,把“教育家—戏剧家—外交家—人权思想家”四重身份织成一张跨越中国与世界的思想网络,使张彭春成为观察20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面独特棱镜。



沽上
丛话

满庭芳

第五四八九期